

引文格式: 骆华, 周文良.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粤东西北地区 12 市的实证研究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 16(3): 36-42. DOI: [10.12371/j.ynau\(s\).202109020](https://doi.org/10.12371/j.ynau(s).202109020).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

——基于粤东西北地区 12 市的实证研究

骆 华, 周文良*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 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在“后扶贫”时代, 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 12 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 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 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 提出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 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普惠金融; 精准扶贫; 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 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2022)03-0036-07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12 Cities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Guangdong

LUO Hua, ZHOU We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ur country has completed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n schedule. In the post-poverty era,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deepen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 inclusive finance to play a greater role.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12 cities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Guang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which affects more on rural low-income groups compared with middle and high-income groups. But for rural low-income groups, th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this pa-

收稿日期: 2021-09-06

修回日期: 2021-10-10

作者简介: 骆华(1994—), 男, 湖南永州人,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 通信作者: 周文良(1971—), 男, 湖北红安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per pu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supply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optimizing the supply mode of inclusive finance,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inclusive finance +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ixed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历史性承诺。在“后扶贫”时代,集中大量资源进行脱贫攻坚的方式面临转变,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粤东西北地区是国内较早推进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2009年开展“双到”扶贫被学界视为精准扶贫的前期探索,2014年全面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2016年正式启动精准扶贫,至今已实现了4000元标准下相对贫困村和相对贫困人口全部出列,具有一定的“先行示范”作用。以粤东西北地区为例,深入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为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针对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金融的“嫌贫爱富”特征使贫困群体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普惠金融可以拓展金融服务对象、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1],缓解贫困人口的信贷约束^[2],促进生产性投资^[3],实现减贫增收。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机制^[4],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6]、增加就业机会^[7],直接和间接地对贫困产生积极和显著的影响^[8]。但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也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制约。对金融机构而言,农村地区业务开展成本高、贷款风险大,导致商业可持续性差,影响参与积极性^[9]。对贫困人口而言,由于金融使用能力不足,利用信贷资金增收创收的效率低下^[10];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信贷资金明显偏向于农村中、高收入水平群体^[11];由于经济机会缺乏,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益要小于农村高收入水平群体^[12]。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普惠金融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保障。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信息、扶贫企业信息的对接共享机制,有利于金融机构把握贷款对象的状况、降低放贷风险,提升普惠金融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13]。精准扶贫担保、贴息等政策的支持,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运营成本

和提高风险保障^[14]。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是否会有所改变?能否对精准扶贫的目标群体起到精准帮扶的作用?是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实现?本文将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分析,对现有研究进行深化和进一步扩充。

一、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直接作用机制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直接作用机制是将农村居民纳入金融服务范围,提供信贷、储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通过降低贷款门槛、改善收入分配、平滑消费、促进生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15],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促进贫困减缓。在粤东西北地区,金融机构通过产业链金融、金融产品和“政银保”项目等途径为贫困人口提供针对性信贷服务,其中,“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已成为推动稳定脱贫、防返贫的重要手段。该模式下,信贷服务帮助贫困群体提升了获得生产要素的机会,也增加了贫困户接受技能培训、教育的机会,在提高贫困群体预期收入的同时,能够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发挥普惠金融的“造血”功能。保险服务是普惠金融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业务,粤东西北地区保险业与各级政府合作,推出了农村人身保险、普惠型补充医疗险、农业保险等多层次保险产品。针对贫困人口,保险机构制定专项保险方案与计划,提供“一站式菜单化”服务,减少了选择盲目性和偏差,扶贫资金进行保费补贴,降低了贫困人口负担。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的协调配合能够更好地服务农村居民,尤其是政策倾斜下的贫困群体。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 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

H2: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贫困群体更为显著。

(二)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间接作用机制

间接作用机制是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间接减贫增收。在微观层面,普惠金

融可以为小微企业缓解融资困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作为农村市场经济的细胞,小微企业具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带动贫困群体脱贫和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外,经济增长有利于提升社会就业水平^[16],为农村地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17]。在宏观层面,农村发展离不开财政投入,精准扶贫的开展力度也较为依赖地方政府的财力,经济增长有利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提高,使当地政府用于农林水事务和农村救济、补贴、保障的财政支出提高,利好贫困群体。经济增长还具有“涓滴”效应,有利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建设、完善,激发农村居民对教育、技能、信息的需求,间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改善整体脱贫环境。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通过直接作用与中介效应共同实现。

二、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一) 指标选取与测算方法

在借鉴部分学者关于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的基础上^[18-19],本文选择金融服务的地理渗透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e Index,下文简称IFI指数)进行测算。其中金融服务的地理渗透性包含每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每百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包含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万人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包含存款余额占GDP比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保险密度三个指标。数据来源:2010—202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2010—2020年粤东西北地区12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采用Sarma构建的IFI指数计算方法进行测算^[20]。假设普惠金融有 n 个评价指标 $D_i(i=1,2,\dots,n)$,每个指标的权重 W_i ,测算普惠金融指数,需要先计算各个指标的测算值和最理想值的欧式距离,再把所有差距整合形成一个测度结果,公式为:

$$IFI = 1 - \frac{\sqrt{(W_1 - D_1)^2 + (W_2 - D_2)^2 + \dots + (W_n - D_n)^2}}{\sqrt{W_1^2 + W_2^2 + \dots + W_n^2}} \quad (1)$$

由于每个指标的权重($0 \leq W_i \leq 1$),所以 D_i 取值范围为 $[0, W_i]$,IFI取值范围为 $[0, 1]$,因此,最理想的是当 $D_n = (W_1, W_2, \dots, W_n)$ 时,IFI=1,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

(二) 测算结果

如表1所示,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9—2014年的缓慢上升阶段,部分城市前期经历了小幅波动,2014年相较2009年指数平均增长了0.04。二是2015—2019年的快速上升阶段,普惠金融发展指数2019年相较2014年指数平均增长了0.09,此阶段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得益于政策推动,按照《广东省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试点方案(2014)》《广东省关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意见(2015)》和《广东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三大政策的要求,粤东西北地区全面推广和开展农村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长幅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系化发展的成效。

三、实证分析

(一) 研究设计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关于资本积累水平与贫困陷阱的相关论述,以及一些学者对财富拥有量与贫困线之间的关系模型推导^[2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衡量减贫增收效应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本文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IFI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引入部分控制变量,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STRU)、固定资产投资(INVEST)、财政收入(INGOV)、邮电业务总量(POST)以及对外贸易(OUTPUT)。为减轻数据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该模型可以得到不同分位点上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由此观察分布规律,探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的异质性。具体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 y_{it} = \alpha + \beta_1 \ln IFI_{it} + \beta_2 \ln \varnothing_{it} + \mu_i + \omeg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 y 为被解释变量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FI为普惠金融指数, $\varnothing$ 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中的下标 i 代表12个市, t 代表年份。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ω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则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1 2009—2019年粤东西北地区12市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

城市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粤东地区	汕头市	0.33	0.37	0.36	0.36	0.37	0.39	0.42	0.45	0.44	0.46	0.48
	潮州市	0.10	0.13	0.12	0.13	0.13	0.13	0.15	0.15	0.17	0.18	0.20
	揭阳市	0.08	0.09	0.09	0.10	0.10	0.11	0.13	0.13	0.14	0.14	0.15
	汕尾市	0.02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5
粤西地区	阳江市	0.03	0.05	0.06	0.06	0.06	0.07	0.09	0.10	0.14	0.16	0.19
	云浮市	0.05	0.07	0.08	0.08	0.09	0.09	0.11	0.11	0.14	0.15	0.15
	湛江市	0.06	0.08	0.08	0.08	0.09	0.10	0.12	0.12	0.13	0.14	0.16
	茂名市	0.04	0.05	0.05	0.05	0.05	0.06	0.07	0.07	0.08	0.08	0.10
粤北地区	梅州市	0.06	0.07	0.07	0.08	0.10	0.11	0.16	0.18	0.20	0.24	0.28
	韶关市	0.07	0.11	0.10	0.09	0.10	0.12	0.15	0.17	0.18	0.19	0.21
	清远市	0.04	0.05	0.05	0.07	0.07	0.08	0.10	0.12	0.16	0.20	0.24
	河源市	0.03	0.05	0.05	0.05	0.06	0.07	0.10	0.12	0.12	0.14	0.18

(二)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被解释变量分位数回归时,当 q 在 $(0,1)$ 上取不同的值,可得到不同的参数估计值。更多的分位点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信息,本文选取九个分位点以代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在实践中,粤东西北地区2009—2012年第一轮“双到”扶贫的贫困人口划分标准为2500元(即2009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2013—2015年第二轮“双到”扶贫的划分标准为3480元(即2013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精准扶贫时期的相对贫困人口划分标准为4000元(即2014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因此本文将10%、20%、30%三个分位点对应贫困群体(即低收入水平),40%分位点对应中低收入水平,50%分位点对应中等收入水平,60%分位

点对应中高收入水平,70%、80%、90%分位点对应高收入水平。

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在9个分位点上,普惠金融指数 IFI 的系数均为正值,也都显著,说明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均具有减贫增收效应。通过比较不同分位点下 IFI 指数的估计系数发现,随着分位数点由低向高变动, IFI 的估计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在 $q=10\%$ 、 $q=20\%$ 、 $q=30\%$ 分位点, IFI 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分别为0.2813、0.2479、0.2219,说明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最为显著。在 $q=40\%$ 、 $q=50\%$ 分位点, IFI 的估计系数小幅下降,说明中低、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益略小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在 $q=60\%$ 、 $q=70\%$ 、 $q=80\%$ 、 $q=90\%$ 分位点, IFI 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小,在

表2 分位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 y$									
解释变量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ln IFI$	0.2813*** (3.69)	0.2479*** (18.51)	0.2219*** (6.51)	0.2051*** (2.81)	0.2076*** (8.30)	0.1732*** (22.52)	0.1647*** (18.73)	0.1574*** (178.50)	0.1716*** (20.83)
$\ln STRU$	0.2600* (1.69)	0.1110*** (5.07)	0.0679*** (3.09)	-0.0116 (-0.14)	-0.1343 (-1.37)	-0.0065 (-0.33)	0.0391*** (3.50)	0.0473*** (21.90)	0.1152*** (11.97)
$\ln INVEST$	0.2128*** (2.82)	0.1965*** (12.38)	0.3330*** (13.11)	0.3815*** (2.83)	0.1007** (2.49)	0.1616*** (9.16)	0.1954*** (8.15)	0.2576*** (69.97)	0.3093*** (30.33)
$\ln INGOV$	-0.0647 (-0.99)	0.0100 (0.25)	0.1806*** (3.23)	0.1898* (1.76)	0.3018*** (3.30)	0.0704*** (3.28)	-0.0761** (-2.13)	-0.1403*** (-41.37)	-0.2990*** (-32.63)
$\ln POST$	-0.0174 (-0.13)	0.0529*** (3.71)	-0.1678*** (-3.57)	0.0441 (0.70)	0.1759*** (2.76)	0.0520* (1.74)	0.2112*** (6.56)	0.1275*** (123.20)	0.1341*** (13.75)
$\ln OUTPUT$	0.0267*** (0.21)	-0.0820*** (-8.08)	0.0474 (1.45)	-0.1983*** (-2.81)	-0.3332*** (-3.58)	-0.0924*** (-5.14)	-0.1247*** (-6.79)	-0.0389*** (-12.96)	-0.0852*** (-6.74)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0.15~0.18 之间,说明农村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益要小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结果表明,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这种异质性表明普惠金融能够对贫困群体发挥精准帮扶作用。假设 H1、H2 成立。

(三) 回归结果比较分析

上述回归结果为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为了对该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采用了随机效应分位数回归和 OLS 回归对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绘制如图 1 所示。

从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与随机效应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系数对比来看,随机效应分位数回归下的各变量估计系数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结果大体一致,但在分位点 $q=20\%$ 、 $q=30\%$ 与 $q=50\%$ 上的 IFI 估计系数相对偏低。从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与 OLS 回归的 IFI 估计系数对比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条件分布的前中端影响大于对中后端影响,与上述研究结论相符。

四、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逐步回归系数法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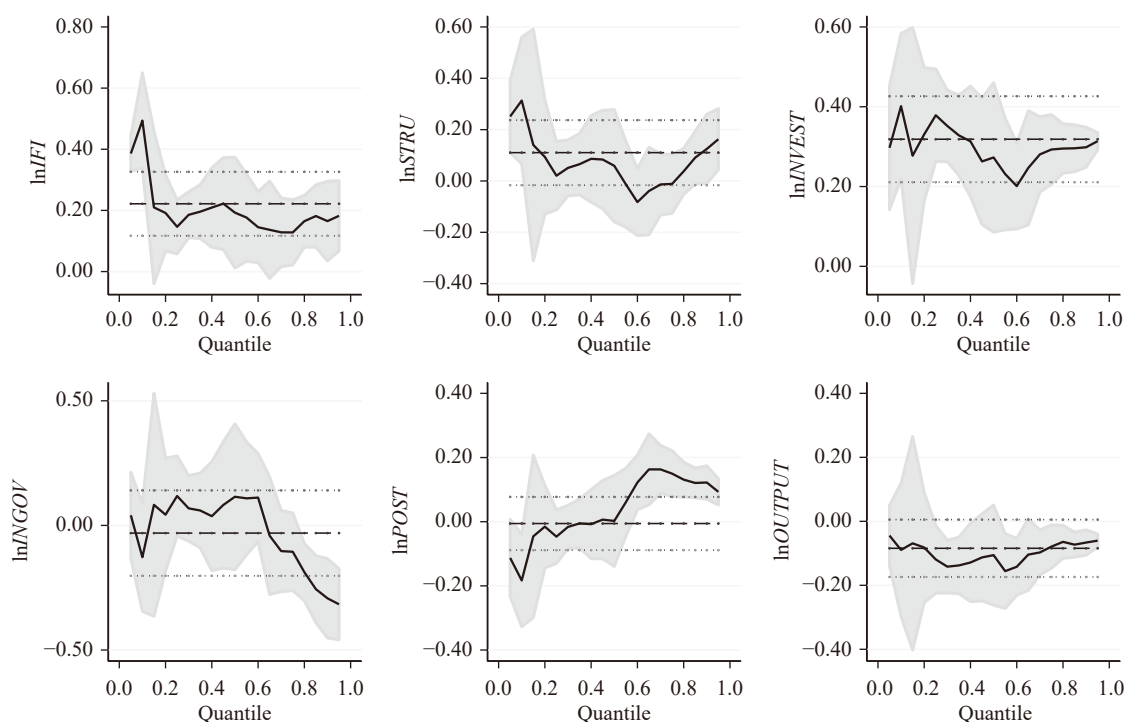
响机制进行分析。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人均 GDP 是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择粤东西北地区各市人均 GDP 作为中介变量。逐步回归系数法分为三步^[22-23],首先检验方程 (3) 的系数 c ,即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总效应;然后检验方程 (4) 的系数 a ,即自变量 X 和中介变量 M 的关系;最后控制中介变量 M ,检验方程 (5) 的系数 c' 和系数 b , c' 为直接效应, ab 为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 = \varnothing_1 + cX + e_1 \quad (3)$$

$$M = \varnothing_2 + aX + e_2 \quad (4)$$

$$Y = \varnothing_3 + c'X + bM + e_3 \quad (5)$$

表 3 回归结果中,在 9 个分位点上,除 a 在 $q=90\%$ 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q=50\%$ 、 $q=80\%$ 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分位点均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 a 、 c' 、 b 均为正值,说明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是共同存在的,假设 H3 成立。从系数 a 来看, IFI 指数对中介变量人均 GDP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在低分位点上这种作用最为明显,说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对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表 4 不同分位点上



注: X 轴为分位点; Y 轴为各个变量的系数; 曲线为分位数回归系数; 阴影部分为分位数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 带空心点粗线为 OLS 回归系数; 空心点粗线上下两条虚线组成的区域为 OLS 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

图 1 不同分位点下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表 3 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结果

系数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a	0.5009*** (4.50)	0.3195*** (6.72)	0.2092*** (11.42)	0.0819*** (3.05)	0.1407* (1.70)	0.0473*** (3.49)	0.0576*** (3.30)	0.0563* (1.94)	0.0105 (0.03)
c'	0.1839*** (9.01)	0.2119*** (6.11)	0.2538*** (30.93)	0.1661*** (17.49)	0.1486*** (6.42)	0.0711*** (7.04)	0.0409*** (2.81)	0.0928*** (12.64)	0.1056*** (13.99)
b	0.7294*** (14.27)	0.7828*** (13.09)	0.7741*** (54.54)	0.7558*** (29.06)	0.7897*** (38.73)	0.8908*** (30.62)	0.8975*** (42.72)	0.8110*** (20.21)	0.7864*** (39.62)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对比结果来看, 在 $q=10\%$ 、 $q=20\%$ 和 $q=70\%$ 三个分位点上, $c' < ab$, 中介效应大于直接作用, 在其他六个分位点上, $c' > ab$, 直接作用大于中介效应。在普惠金融实现减贫增收效应的机制中, 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 中介效应大于直接作用。而对于其他收入水平群体, 直接作用大于中介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主要结论如下: (1) 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减贫增收; (2) 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存在异质性, 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 说明普惠金融能够对精准扶贫的目标群体发挥精准帮扶的作用; (3)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通过直接作用和中介效应共同实现, 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作用。

在不同扶贫政策下,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发生变化, 其原因值得思考。在传统粗放式扶贫阶段, 扶贫工作主要以贫困县、贫困村为推进单位, 金融资源的调配、扶贫资金的使用无法做到精准地帮助贫困户, 加上精英俘获现象、金融利用水平、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 农村中高收入水平群体相对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在精准扶贫阶段,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要求, 使得政府扶贫资金和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落到贫困人口上, 且粤东西北地区通过重点开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 加上针对性

的扶贫贷款产品、政策性普惠保险产品,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群体的不利状况。但是贫困人口在获得资源倾斜的情况下, 金融资源的使用能力仍显不足, 与乡村精英群体相比都存在差距, 导致直接利用普惠金融资源转化为实际收益的效率不高, 更多是靠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实现减贫增收。

在“后扶贫”时代, 如何让普惠金融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和优化供给方式, 当前供给结构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比重的失衡, 造成了较大的资金缺口, 制约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 因此需要着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进行平等、互利合作, 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撬动更多社会金融资源进入。此外, 传统的金融供给方式在农村地区受到较多的条件限制, 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下, 普惠金融需要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以此扩大空间覆盖率、降低服务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二是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 此模式对贫困户而言“造血”作用突出, 对金融机构而言风险相对较小、利润有所提升, 对政府而言扶贫资金投入更精准、扶贫效率较高。在实际中, 产融结合过程仍存在许多问题, 本文认为在产业项目规划前期论证时, 规划主体应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对接, 金融机构在权衡实施成本、预期效益上具有专业优势, 参考其意见与建议, 能够为产融结合良性发展打好基础。在产业项目开展时, 规划主体和金融机构

表 4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对比结果

系数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c'	0.1839	0.2119	0.2538	0.1661	0.1486	0.0711	0.0409	0.0928	0.1056
ab	0.3653	0.2501	0.1619	0.0619	0.1111	0.0421	0.0517	0.0457	0.0083
结果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要从整体考虑金融风险的控制问题,解决不同环节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降低产业项目的管理成本和农业企业、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三是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户)存在金融使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普惠金融效率,也不利于需求侧的发展。因此金融帮扶不能只着眼于增加金融资源的供给,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有必要针对性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金融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

[参考文献]

- [1] 何学松,孔荣.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3):76. DOI: 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3.10.
- [2] DABLA NORRIS E, JI Y, TOWNSEND R M, et al. Distinguishing constraints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TFP,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1, 117(1): 1. DOI: 10.2139/ssrn.3483633.
- [3] 顾晓安,庄晓栋,许泽庆.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1):108. DOI: 10.3969/j.issn.1003-4625.2020.01.015.
- [4] REDDY J V R. Financial Inclus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India [J]. AMBER-ABBIS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Review, 2014, 5(1): 38.
- [5] 李建伟.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10):14. DOI: 10.16475/j.cnki.1006-1029.2017.10.002.
- [6] 刘金全,毕振豫.普惠金融发展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双重视角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40(4):37. DOI: 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04.004.
- [7] INGRATUBUN E S, HASANUDDIN B, ZAMHURI M Y, et al. Determin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gainst poverty in eastern Indone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JAR), 2018, 6(11): 310. DOI: 10.21474/IJAR01/8000.
- [8] 蔡则祥,杨雯.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关系的理论研究[J].经济问题,2019(10):26. DOI: 10.16011/j.cnki.jjw.2019.10.005.
- [9] 洪晓成.普惠金融理论与我国农村金融扶贫问题调适[J].山东社会科学,2016(12):83. DOI: 10.14112/j.cnki.37-1053/c.2016.12.013.
- [10] 程惠霞.普惠金融发展新路径:赋权与使能双驱动[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5):15.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0.05.002.
- [11] 邓伟平.农村信贷资金“精英俘获”问题研究[J].浙江金融,2018(4):45.
- [12] 朱一鸣,王伟.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J].财经研究,2017,43(10):43. DOI: 10.16538/j.cnki.jfe.2017.10.004.
- [13] 郭晶.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开展[J].农业经济,2019(4):94. DOI: 10.3969/j.issn.1001-6139.2019.04.037.
- [14] 刘涛.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耦合与实现途径[J].桂海论丛,2017,33(1):98. DOI: 10.3969/j.issn.1004-1494.2017.01.017.
- [15] 贾晋,肖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17(1):70. DOI: 10.16354/j.cnki.23-1013/d.2017.01.012.
- [16] 顾宁,张甜.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J].农业技术经济,2019(10):74. DOI: 10.13246/j.cnki.jae.2019.10.006.
- [17] 章元,许庆,邬璟璟.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J].经济研究,2012,47(11):76.
- [18] SARMA M, PAIS J.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23(5): 613. DOI: 10.1002/jid.1698.
- [19] 马彥菲,杜朝运.普惠金融指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5):45. DOI: 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7.05.005.
- [20] SARMA M.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 (Very preliminary draft) [J]. general information, 2008(1): 1. DOI: 10.1530/endoabs.32.P228.
- [21] 卢盼盼,张长全.中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J].宏观经济研究,2017(8):33. DOI: 10.16304/j.cnki.11-3952/f.2017.08.004.
- [22]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 DOI: 10.1037/0022-3514.51.6.1173.
- [23]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 DOI: 10.3724/SP.J.1042.2014.00731.

(责任编辑:许敏)